

反思一下这面“锦旗”

凌河

今日论语

一群居民给政府送了一面锦旗，政府为什么“如坐针毡”——昨天《新民晚报》浓墨大字的头条，我读了数遍。这不只是一篇颂扬政府办了实事的“正面报道”，字里行间透着深深的反思；这不只是一则只讲官民如何融洽的表扬稿，还突出着政府收到锦旗收获赞扬后的“惭愧”和“自省”。这个头条的意义，在于它有着深刻的政治学价值，在于它告诉我们如何看待感激背后的干群关系。

务于人民，是党的宗旨、政权的性质所规定的天经地义，我们的干部，不是“社会主人”，而是人民的公仆，为人民谋福祉，办实事，解忧惠，是最分内、最本分、最底线的责任。所以各级政府、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为群众办事，老百姓完全不必感恩戴德，更不必专门送一面“锦旗”——我们在每次选举时投的选票，我们的代表在各级人代会上对政府工作报告的表决，已经是对权力的授予和赞成。可惜的是，也有这样的“公仆”，忘记了“权力是谁给的”，把为群众办了哪怕一点事儿，都当做一种恩赐，在那里春风满面地笑纳群众的锦旗，心安理得地接受老百姓的感激，正如我们在荧屏和报纸上经常看到的那样。所以说，小小一

面锦旗面前，反映出的却是一个政治学的大道理。徐汇区建交委在锦旗面前的态度，是应当受到称赞的。他们收到锦旗，如坐针毡，却反而要把它挂起来。派什么用场呢？作为一面“镜子”，天天面“旗”自省，想一想为什么一条无障碍通道让居民一等就是20年？有的时候，锦旗确能成为一种镜鉴，有的干部办了一些事情，老百姓说了一些好话，就云里雾里了，就要吹一下了，其实面对“锦旗”，更应想一想，这样的实事，为什么拖了那么久？为什么更多的好事不能办好？为什么有些善举，普惠程度不高，阳光不能普照，群众意见还那么多？等等。在锦旗面前，深感惭愧，痛思不足，可不光是一个一分为二看

问题的方法论哦。群众是最好的，最宽容，最通情达理的。你看，一条无障碍通道等了20年，今天搞成了，老百姓还是没啥说的，也不责备，还是上门送锦旗。这对身为公仆的党员干部，其实是一种深深的鞭策。面对这样的锦旗，这样的民心，如果不珍惜，不自责，不反思，反而安然自得，那丧失的，就不会只是老百姓的“锦旗”了。例如那条无障碍通道，虽然迟到了20年，但亡羊补牢，总归还未为“迟”吧——如果大大小小这样的“通道”再拖下去，老百姓恐怕就不光是再也不送“锦旗”啦。面对“锦旗”的反思，说的不只是徐汇区这一面锦旗，而本文要说的，又岂止一个“锦旗问题”呢？

新民随笔 职业

董纯蕾

十岁二十岁时，你有过心仪的职业吗？十年二十年后，职业给你烙下了印记吗？我有。十几岁时，在我向往的职业名单上，分明有过“作家”。而现在，我几乎成天写作，却因为多年科技记者的职业习惯，再也写不出那些年的诗与散文、爱与忧愁、纯粹追求文采的华丽丽句、以虚构为主的大段描写。在我的脑中与笔下，翻来覆去的都是事实、逻辑与知识。科学家们说，没错，大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职业塑造的。尽管相关原理大部分尚不明朗，但是越来越多的大脑成像已证实，大脑的职业化改变清晰可见，名副其实。神经科学实验观察到：出租车司机的大脑海马后侧(主管空间记忆的关键区域)异常发达；运动员的大脑皮层灰质(涉及运动技能)体积增加；调香师的初级和次级嗅觉皮层体积更大但活跃度弱于常人……如果早知道职业会如此改变大脑，你还会像当年一样选择职业吗？

有段日子追美剧《绝望主妇》，常常“爱美之心”作祟，直接快速进到帅哥麦克的段落。麦克在剧中的职业是水暖工，日子过得不错。后来，此剧不时被用作我的谈资，不再是关于以貌取人，而是常拿麦克的职业来说事儿。水暖工也可以在紫藤巷的中产阶级圈里生活得很舒坦，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，而且关乎职业身份的平等与相容。当然，此处我用了“也”，很明显已暴露了那些固有观念。水暖工的大脑里，哪个区域会比一般人发达，这种发达又会给生活带来哪些惊喜，这些本不在人们的职业观里。教育部说，以后的大学教育会分技能型和研究型两种。有不少人猜，当年那么多大学，宁愿抹去历史上曾经那么辉煌的特色，也要从理工科大学“摇身一变”为综合性大学。现在，又有多少愿意给自己贴上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标签？或者，我们都该以科学家的视角来看待职业。某个任务不断重复，精于此道者，有些大脑区域可能会变形，有些会重构，有些会受到抑制。无论你从事的是技能型还是研究型职业，皆是如此。仅此而已。

新民新语

“PX”和临终关怀

左妍

近日，百度百科上掀起了一场“词条保卫战”，清华学子和一些网民就PX是“低毒”还是“剧毒”展开“搏斗”，最终清华学子获胜，将PX科学地定义为“对二甲苯，低毒化合物”。这已不是第一次掀起有关“PX”的讨论。此前，宁波、厦门等地都有群众反对PX项目，政府部门不得不退让，宣布“不再发展此项目”。这种博弈的结果仿佛达成了一种思维定势，也加深了部分民众对“PX”的恐慌。

为什么有人谈“PX”色变？2011年，大连某PX项目因台风引起海水倒灌发生溃坝；2013年，福建漳州PX项目厂区发生爆炸。这些事实让人们政府对宣传的“PX项目安全可靠”打上一个问号；而另一方面，即便“PX”本身的危害可忽略不计，但生产企业究竟有没有按照国家环境标准从事生产？万一有偷工减料、偷排偷放，这种风险谁来承担呢？我想起不久前有人投诉，某居民区周边要建“临终关怀护理院”，居民情绪激动，称这种机构令人“毛骨悚然”，甚至拉横幅“反对在小区旁造太平间”。造护理院的提案最终流产。且不论其中原因，就人们对“临终关怀”的认识来说，和“PX”一样存在误区。现代人受传统观念影响，不想与死亡的阴影相伴，担心小区周边成“殡葬一条街”，这种反对也不无道理。但其实，国外的临终关怀是一项服务老人的阳光产业，老龄化社会也需要这样的服务机构，为何我国临终关怀事业刚起步就遇到重重阻力呢？

我想，这些问题政府和企业应该认真考虑。刚刚听到反对的声音，若不予重视、遮遮掩掩，那么，公众的本能恐惧就放大；建成后若没有严厉监管导致漏洞频出，倒霉的还是公众。给公众足够的知情权，让居民知道究竟在建什么，会有什么风险；足够的民主权，让居民民主参与到是否落户的决定中；足够的监督权，让居民明白地看到生产流程、服务内容，只有这样做了，才有可能让“PX”、临终关怀，以及别的“敏感”项目顺利落实、惠及大众。

政府购买服务不是一锤子买卖

日报观点

武汉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建立4年以来，从“民心工程”变成了“闹心工程”。记者采访发现，许多用于管理公共自行车的站点岗亭无人值守，智能租车系统无法使用，即使有几辆自行车，也多是“缺胳膊少腿”的破车。

2008年前后，国内一些城市陆续开建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，成功案例并不多。当然，堪称模范者也不是没有，如杭州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，就被评选为全球最好的地区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之一。“杭州模式”的运营方式被简要概括为“政府主导，企业运作”。

从建立开始，杭州就设计了租赁系统的长效机制，并非撒手让承办企业自由发展。杭州自行车租赁由当地国有企业公交公司运营。市城管办、各级政府、市建委是租赁系统“建设和管理协调小组”的成员单位，而城管、交警、公交、街道社区也参与到租赁点布局工作中。

而在武汉，政府并未真正实现主导。政府仅在初期建设时投钱和投入公共资源，没有拿出长期监督的有效方案。而且运营企业是民营企业，公益事业与商业投资的边界模糊，这才形成公租房系统瘫痪而运营企业赚钱的怪现象。

政府购买服务不意味着责任转移，提供服务以及监督的责任仍然属于政府部门，不能简单交给市场了事。(王钟的 刊今曰《中国青年报》本报有删节)



蕉色变图

谢春彦

甲午之春，闻有香蕉“艾滋病”之说，一时心怖。而有智者宽慰云，与人无涉，图以志。

权威声音

从PX项目屡屡下马，到垃圾焚烧厂被迫停产，再到火葬场放弃建设，近年来，多地反复上演“上马—抗议—停止”的剧情。一概反对，成了群体过激反应的本能姿态；一闹就停，成为一些地方应对抗议的自然选择。这种困局，不仅消损着政府的公信和权威，也浪费着不菲的社会成本和发展机遇。

不能说，反对没有道理。趋利避害，是人之常情。如果在小区附近建学校、托儿所、疗养院，居民都会双手欢迎；而倘若建设垃圾场、核电、化工等项目，就很可能引发各种担心。人们虽然认同这些项目的必要价值，却希望“不要建在我家后院”。这就是所谓的“邻避运动”，并非只是中国独有。

靠什么破解“一闹就停”难题

范正伟

这就是社会运行的复杂性所在：许多时候，个体的理性，可能形成公共的非理性；一时的利益，可能造就长久的困局。没人同意建在“自己的后院”，那建到谁的后院去好呢？每个人都寸步不让，公共利益又如何达成呢？从这个角度，不管是“政治正确”，还是“道德正确”，都应该回到事物本身、回到常识上来。公众需要涵养理性，媒体需要捍卫常识，政府则需要提高能力。

从近年来一些邻避设施上马的过程看，一些地方政府的程序说服能力的确有待提升。事后解释，不如事前说明；替民做主，不如与民协商。只有“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，重

大决策让人民讨论”，从“决定—宣布—辩护”模式走向“参与—协商—共识”模式，在充分考虑人们利益的基础上因势利导，并建立起一定的利益补偿和平衡机制，邻避设施建设才能有广泛的民意基础，从而减少潜在的冲突压力和下马风险。另一方面，对于那些着眼公益、计之长远的正确决策，地方政府也要敢于坚持，勇于担当。

而从公众视角观之，那种“鸡屎拉在我家后院，鸡蛋却下在别人家”的激愤心态，有时也有失偏颇。生活在现代社会，我们不可能既要求交通便捷又希望谁都不住在喧嚣的马路边，既要求环境整治又不希

望小区里建垃圾站，既要求手机信号总满格又不允许设电信基站。每个人的利益合起来叫做公共利益，而公共利益的维护，来自每个人在合理范围内让渡一部分个体利益。

走出“一闹就停”的困局，公众应该看到政府建设公共项目中的良好初衷，政府也应该理解公众焦虑的现实根源。只有平衡好个体诉求与公共理性、多数利益和少数权益，共同涵养现代社会的公民素质，共同完善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，将公共治理的目标与过程更好地统一起来，才能让每个人都能从发展中受益，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支持发展的一分子。(刊今曰《人民日报》本报有删节)